

「三一七」書感

王蒲臣

——為戴笠先生殉職三十六週年紀念作

三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我們中國的情報工作創始人，也就是軍統局工作的領導人戴雨農（笠）先生在民國三十五年殉職的日子。

我國的情報工作，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機構，由戴先生專負其責，過去軍統局每年的四月一日，都要舉行紀念會，尤其是在十週年紀念時，擴大舉行，所有外動單位負責人，差不多都應邀參加。晚間還有同樂晚會。

第二天開始，接着開工作檢討會。每年的四月一日開會這一天，一直稱之謂「四大會」。自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殉職之後，為了紀念戴先生之故，將四月一日工作成立紀念與戴先生殉職紀念改於三月十七日合併舉行。自此之後，就稱「三一七」紀念大會，而不稱「四大會」。

大陸淪陷，繼承戴先生事業的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局長率領全體同志，除派在淪陷區做潛伏工作的同志以外，統統隨政府遷來台灣繼續工作，每年舉行「三一七」紀念大會，除有特殊事故之外，差不多都由先總統蔣公親來主持，可見得先總統蔣公對於這一紀念會的重視。而且每次講話，都要提到戴故局長（戴先生殉職時，為軍統局局長）。遠近趕來參加的同志，不下四五千人，不特擠滿了禮堂，即是操場、走廊上，也

都站了人，這是任何機關團體所萬萬做不到的。此無他，因為同志的心目中，絕不因時間的過去，而沖淡了對戴先生的懷念。

每年的「三一七」，自三十八年起，除了有特殊事故，每次我都參加。

民國三十八年上半年，我負責保密局在青島的工作。三月十七日這一天，我召集了在青島的同志，在湛山寺集合，舉行紀念會，由我主持報告戴先生的生平事蹟。

民國三十九年的「三一七」紀念會，未及參加，事情是這樣的。三十八年九月，先總統蔣公駐節重慶，我奉國防部電令，要我即日飛渝待命，當時並不知道有什麼任務。直到重慶之後，才知道要我親日籌辦「重慶幹部訓練班」。因為時機迫促，不能和平常一樣的登報招考，乃從六七百名流亡學生中，挑選數十名精華，並能在非常時期而有掩護職業者。所以素質非常之好，於是即日開始訓練。十一月底，渝市告急，我率領重慶幹部訓練班全體員生於十二月一日分乘卡車四輛，開往成都。誰知剛到不久，蓉市局勢又緊，這批學員，既不能繼續受訓，又再無地方可退，苦思焦慮，寢食不安。同月五日，奉令將幹部訓練班解散，大部份學員送中央軍校第二十四期受訓，女

生則送軍校醫務所工作。另一部份，則分送交警及蓉市警察局安插。職員每人加發餉銀一月，返鄉潛伏，並另發回鄉旅費。臨別那一天，班裏添了幾樣菜，歡送他們，說明幹部訓練班不能繼續訓練，因而不得不解散的苦衷。大家聽了之後，依依不捨，泣不成聲，雖有佳肴，亦難入口，學員們衆口同聲的說：「萬一無路可退，願隨各位長官去打游擊，亦不願離開幹部訓練班。」那種感人的場面，永念不忘。經我再三勸慰，方才答應。大陸淪陷之後，這批學員，除在軍校受訓的已在台灣畢業外，其他生死存亡，不甚明瞭。據報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軍校率領學生開往西昌，行經雅安時，與叛逆劉文輝部發生遭遇戰。幹部班送往軍校之女生秦靄齡、劉淑貞兩員，為流彈所擊斃。秦生為先烈秦啓榮先生的女兒，秦啓榮先生是抗戰時在山東被匪所殺害的。劉淑貞係西南區電訊督察馮照的妻妹，馮亦在匪區被害。

最可惜的，幹部班一切文卷，均因時局緊張，不便攜帶而全部焚燬，保密局亦因當時交通不便，沒有收到幹部班呈報的文件而無案可稽，以致受過幹部班革命禮體的學員，連名單也沒有一張。說起來，真是痛心！這是保密局在大陸變色前最後的一個訓練班。有始無終，沒有訓練完成

。在他們的心目中，也認為是保密局的一份子，三十多年來，可能已有許多轟轟烈烈的事蹟留人問了。十二月九日，我乘國防部專機，由成都飛往昆明，剛好碰到盧漢在這一天明目張胆的宣佈脫離中央而實行叛變了。我們一共一百五十餘人全部被扣。我被扣留了四十五天，才設法由昆明經蓉益、貴陽、湖南、廣州而達香港。在港休息兩星期，再來台灣，預計可以參加這一年的「三一七」紀念大會。誰知我於三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到達基隆，竟因數小時之差，而未能趕到參加「三一七」紀念會。

自民國四十年至六十三年，每年參加「三一七」紀念會的人數，就我日記上所記載的：

- 四十一年 五千七百三十六人
 - 四十二年 五千〇十二人
 - 四十三年 三千四百五十二人
 - 四十四年 二千八百三十二人
 - 四十五年 五千八百二十七人
 - 四十六年 五千三百六十人
 - 四十七年 五千六百九十七人
 - 四十八年 五千七百二十四人
 - 四十九年 五千六百二十八人
- 就我日記上這九年有人數記載的，平均每年參加人數為五千〇三十人。

每年主持「三一七」紀念會的，大多是總統蔣公，（今總統經國先生也偶爾主持），有幾次他們提到戴故局長的話，我始終沒有忘記。

民國五十七年，先總統 蔣公說：「戴故局長自從殉職到今天，已經有二十二年了；但是，

我們大家對他從事情報工作的成就和功勳，對國家主義的貢獻和偉績，都沒有特別的表揚。尤其是現在共匪對我們派赴大陸的情報工作人員，加以殘殺、傷害，受到了不可想像的脅迫，真所謂求生不得，求死無路。我們對於情報工作人員，一定要誓志予以洗雪、報復，以克盡死者死者的責任。」又說：「戴故局長殉職二十二週年以後的今天，他所蒙受的污辱與冤曲，已無形中由若干客觀事實得到昭雪，他的豐功偉績也逐漸為世人所瞭解；而共匪的虛偽、欺詐，被世人所揭穿、所深惡痛絕。……」

民國五十九年，先總統 蔣公說：「本局的工作，自戴故局長創立領導以來，匆匆渡過四十年頭了，雖然這並非是個很長的時間；但是在本局的工作史上可歌可泣，英勇超人的事蹟，却不斷的在長成中。」

民國四十年，由蔣主任（現任總統經國先生）主持「三一七」紀念大會。他說：「第一，戴故局長忠於 領袖；第二，絕不自私；第三，只要認定此事是否應做，絕不怕難。」

民國四十六年，蔣主任說：「天下之大，有能如戴故局長實幹苦幹而無絲毫私心者有幾人？無怪乎事隔十一年，而一般同志言念及此，仍無不感慨系之。」

民國五十六年，蔣院長（即今總統經國先生，那時任行政院院長）說：「我個人有兩件事情感覺得很遺憾。一件事是在七年前，我就開始為戴故局長寫傳記；可是，七年的工夫，一方面是

蒐集資料困難，一方面是工作繁忙，所以到今天還沒有完成。因為戴故局長感人的事蹟很多，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很大，我將繼續寫下去，一直到寫完成為止，以表彰他的豐功偉業，告慰他在天之靈。……」又說：「戴故局長有三種基本精神：第一是不怕敵人的勇氣；第二是不怕困難的意志；第三是不怕犧牲的決心。這三種因素，都是革命成功的主要動力。在革命最後關頭，只有以不怕敵人，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才能完成總統所交付我們的一切責任。」

民國六十二年，蔣院長經國先生說：「戴故局長手創本局，十五年間，對 領袖，對國家所提出的貢獻至鉅。即以三月十七日氣候如此之惡劣，不顧同志之勸告，擇善固執，勇往直前，此種忠誠為國之精神，實足令每一國人效法。戴故局長殉難實在是國家以及本局無可補償之損失。」又說：「戴故局長是 領袖的信徒，是革命的實行家，有生之年，無時無刻不以『體念 領袖苦心』為懷，矢勤矢勇，豐功偉績，永垂青史。」

民國六十五年，蔣院長說：「戴故局長的精神，就是堅持革命的立場，堅持革命的原則，與三民主義的敵人奮鬥到底，一切為 領袖，一切為黨國。」

從上面幾段話看起來，先後兩位蔣總統，都對戴先生非常懷念，而且盛讚他的豐功偉績，情報局的同志，能不更懷念他嗎？

時光如駛，戴先生殉職後的第卅六個「三一七」又來到了，我已八十多的高齡了，景懷戴先生英風偉績，痛恨遺囑空懸，怎不令人潸然淚下。